

叶圣陶同志生平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叶圣陶同志，因病于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叶圣陶同志，名绍钧，1894年10月28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城内一个平民的家庭。因家境清贫，1912年中学毕业后，即开始当小学教师并从事文学创作。五四运动前，参加了李大钊、鲁迅支持的“新潮社”。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论文、小说、散文、新诗、童话等，这些作品充满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示了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光明的向往。他还与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等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并出版了我国第一个童话集《稻草人》以

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立即写了《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这一名篇，并与郑振铎、胡愈之等对当时上海的报纸“对于如此惨酷的足以使人类震动的大残杀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表示愤慨，倡议出版了《公理日报》。“四·一二”事变后，他主编《小说月报》，提倡作家“要写这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发表了不少反映大革命时代的作品，并最先写出了谴责反革命大屠杀的短篇小说《夜》。1928年，他创作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反映了从五四时期到大革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发展过程，批判了改良主义，讴歌了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期间，他举家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他是为人民立言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位极为勤奋的作家。他的大量作品，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叶圣陶同志为我国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70多个春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出大量有关教育、教学的专

论、专著和书简。他很早就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主张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提倡引导与启发，“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达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攻关能自勉的主动境界，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他对汉语语言的规范化、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科学化系统化，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具有独到的见解和重大的贡献。

叶圣陶同志从1923年起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1930年起又到开明书店任编辑。他说过，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确实，他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的时间长。他所编辑的大量书籍杂志和课本，都体现出他处处为读者着想，特别注重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态度至为诚挚，工作极端认真。他在三十、四十年代主编的《中学生》杂志，是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他非常乐于帮助和扶植新作者，许多成名作家的处女作，是经过他的手发表的，并写了不少对新人新作的评价，给予鼓励和推荐。一直到“耳

失其聪、目失其明”的耄耋之年，仍不遗余力地为有关单位及出版社审阅重要文稿。

叶圣陶同志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强的民主战士。他不断追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他就是党的亲密朋友。在五卅运动和大革命期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一贯赞同拥护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早年，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力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又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图书审查制度，联合重庆、成都的几十种刊物，拒绝送审。1946年回到上海，目睹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又奋不顾身地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等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们“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个目标而斗争”，“汇为巨力致民主”，“转移风气，挽回世运”，开创“为万世开太

平”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影响下，他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文教战线上无畏的斗士。1949年初，叶圣陶同志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辗转到达已解放的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6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圣陶同志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建国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他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主席等领导职务，是民进全体会员极为尊敬和爱戴的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他为民进的建设和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为发展人民教育和出版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不顾年事已

高，仍然勤奋地写作，发表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新一代、描写新中国新面貌的优秀作品，并对教育、文化、出版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有益的建议。他多次指出：“我们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根本在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小学。小学教师的辛勤劳动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他曾在《中国青年》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呼吁》的文章，针对社会上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偏向，语重心长地说：“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他的呼吁和建议，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党中央的倡导下，尊师重教的风气正逐渐形成。他在民进的一次会议上又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知识分子将何以自处”的问题，告诫会员要正确地对待自己，不断地充实自己。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教育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以及对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

叶圣陶同志平易谦和，诚朴敦厚，谨言慎行，表里一致，坚持真理，一丝不苟。他从来不说，不写一句违心的话，总是勉励大家要“少说空话，多办实事”。他的品德、文章、事业、言行，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读者、教师、学生、

编辑和出版工作者。他的不平凡业绩，犹如积沙成塔，滴水成海，是在平凡中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他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楷模，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在各方面都不愧为一代师表。他的逝世，使文化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巨人，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哲人已萎，典范永存。我们要永远学习他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党的十三大路线的指引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

敬爱的叶老同我们永别了！叶圣陶这个光辉的名字，将永载史册！

（新华社发）

叶圣陶同志在京逝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八时二十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四岁。

叶圣陶同志是江苏省苏州市人，曾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学创作七十多年。五四运动前，他参加李大钊、鲁迅支持的“新潮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托命于文艺”的战士、我国新文学史上的先驱者之一。一九二一年，他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为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同志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等许多领导职

务,为发展人民教育和出版事业,为巩固和发展
爱国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 2 月 16 日电)

叶圣陶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1988年2月29日下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低回的哀乐淹没不了人们的哭泣之声，千余名各界人士在这里向五四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叶圣陶先生挥泪诀别。

2月16日离开人世的叶圣陶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覆盖在他身上的白缎映衬着叶老那双被94年风霜染白了的浓眉。冰心托女儿送来的花篮紧靠在他的身旁，花篮的挽带上是冰心的手书：“圣陶前辈灵次。”

众多的花圈和花环摆放在灵堂内外，赵紫阳、邓小平、李先念、李鹏、陈云、彭真、邓颖超、聂荣臻、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乌兰夫、杨尚昆、胡耀邦、薄一波、习仲勋、阎明复、温家宝、王首道、刘澜涛、肖克、陆定一、陈丕显、胡乔木、程子华、胡厥文、许德珩、彭冲、朱学范、周谷城、荣毅仁、楚图南、杨静仁、康克清、庄希泉、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钱昌照、董其武、陶峙岳、杨成武、陈再道、吕正操、周培源、包尔汉、缪云台、王光英、邓兆祥、费孝通、赵朴初、屈武、巴金、马文

瑞、茅以升、刘靖基、王恩茂、钱学森、雷洁琼、汪锋、钱伟长，以及孙起孟、黄鼎臣、林盛中、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同志送了花圈，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民进中央、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文化部、新闻出版署、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文联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以及江苏省和苏州市领导机关等也送了花圈。

李鹏、邓颖超、乔石、胡启立、姚依林、阎明复、刘澜涛、胡乔木、周谷城、杨静仁、康克清、钱昌照、陈再道、吕正操、周培源、包尔汉、王光英、费孝通、赵朴初、屈武、马文瑞、钱学森以及孙起孟、黄鼎臣等同志佩戴白花，和排着长队的各界人士一起向这位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遗体鞠躬致哀。

叶老的为文、为人之道深深地叩动着人们的心。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王泗原泣不成声，他断断续续地告诉记者，他的两部书都是经叶老认真修改、审阅出版的。他说：“叶老一生不知奖掖了多少后人，他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和长者。”

身穿军装的部队作家王愿坚难忘叶老为他改稿的事。1958年，他和叶老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时写出小说《普通劳动者》，叶老对稿子作

了认真修改并撰文予以肯定。王愿坚说：“是叶老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站在一边的浩然情绪激动，他说：“叶老不仅教我们如何做文，还教我们怎么做人。我们这些年轻一代不但要学习他在文学艺术上的追求，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做个正正派派的作家、正正派派的人。”

人们深情地凝望着叶老，把叶老的容貌铭记在心。展望出版社的总编辑阮波在叶老的遗体前，拍下好几张照片，她说：“我听过叶老讲课，叶老还批改过我的作品。他对待我们晚辈如同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我要记住他！”84岁高龄的吕叔湘先生不顾病痛，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到叶老的身旁，满含泪水，向叶老告别。

当年经叶老审阅的《小布头奇遇记》的作者孙幼军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从外交学院赶来了，这时告别仪式已快要结束。他深情地说：“我要再看他老人家一眼。”他说，“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留下了作品、精神和道德，谁又能忘记他呢？！”

叶圣陶逝世后，他在美国、日本、新加坡、苏联、荷兰、意大利、南斯拉夫、联邦德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生前友好，发来了唁电、唁函，或打来电话，对叶老的逝世表示沉痛

哀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也发来了唁函。
(新华社北京 2 月 29 日电)

《角直闲吟图》题记

叶圣陶

余到角直任教于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盖应同学兄吴宾若王伯祥之招。时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所设之尚公学校，二兄书来，谓往时意气相投，共事教育，必所乐愿。余遂辞尚公而就五高，于一九一七年春季开学前与二兄同舟到角直。宾若任校长，伯祥与余皆任级任教员。二兄在校已几何时，不能详忆，惟至多不逾二年。

一九零七年春，苏州公立中学校（即以后共称为草桥中学者）创办招生，宾若伯祥与余皆考取入学。入学之后又加甄别，其学业较优者为二年级，二兄与焉。迄一九一零年终，二兄毕五年之业，而以实际修业未足五年，不能取得“举人”资格，须留校补修一年乃可。故二兄与余同于一九一一年年终毕业，其时清廷已覆，自无所谓“举人”资格矣。一九一二年，宾若任初等小学校校长，其校在阊门附近。伯祥就苏州宪兵营事，类似今之所谓秘书者。余任干将坊言子庙初等小

学校级任教员。宾若改任五高校长不记在何年，惟记其到角直即与伯祥偕。

五高在保圣寺大殿之西南侧，校门前偏左为坍塌之天王殿。校之北大殿之西为鲁望祠，与校隔一墙，墙有门，启钥可入。大殿之东北为角直初等小学校，校舍多于五高，运动场尤宽广。自天王殿南行数十步为山门，石柱尚在。山门外则市街，又数十步而至香花桥。余记其大概，藉见往时保圣寺占地之广。

五高男子部女子部各有一楼，不相连属。楼皆上下二室，男子部楼为四班之课堂，女子部楼为三班之课堂，余一室。男子部楼逾庭院而东为一敞厅，前不设门窗，两侧为办公室。举行全校大会皆在此敞厅，其时男女学生乃共处一堂。男子部楼与庭院之南有一屋，玻窗北向，五人居之。床皆贴南壁，自西而东，首宾若，次伯祥，次为余，次算学教员孙建平，次体操教员董志尧。书桌临窗，其序与床同。夜间点白瓷罩煤油桌灯二盏，当时已觉颇为明亮矣。

每日散学之后，家居本镇之教员各归其家。外来之五人则为共同生活，业务工作，业余闲遣，三餐一宿，皆聚处而不分。今姑回忆而杂记所谓业余闲遣者。夜谈多在室内，值月朗风清，

则各携椅坐庭院中。晚餐时偶亦沽酒共酌，发起者作东，佐饮自必闲谈。宾若清谈娓娓，体贴人情入细。夙以善唱歌称，兴到则曼声低唱。伯祥最健谈，多说轶闻掌故。能以扬州方音唱郑板桥《渔樵耕读》道情，又能唱京戏若干出之片段，他人促之不休，则慷慨应承，引吭而歌。由今思之，二兄当时之声容犹宛在耳目间也。至于星期日或其他假日外出游散，则往往三人行，而孙董二君不与焉。吃茶于万象春。其肆虽简陋，而镇上所谓士绅者颇趋之，临河踞座，高谈阔论。饮酒于财源店，店在保圣寺山门外。财源为店主之名，其妻善治饌，鱼虾蔬菜皆可口，而索值不昂，有时至殷家听弹词，有时至某公所听昆曲。殷家者镇上之大族，英文教员殷康伯亦草桥同学，其族中常邀苏州说书人之来镇弹唱者每日下午到家说书一回，合族男女共听之。镇上人多嗜昆曲，其闲暇者集于某公所，延曲师教授拍曲，进而至于串演。尝见名曲师沈月泉教演《长生殿·小宴》唐明皇上场时所唱“天淡云闲”一曲，逐字逐句指点，目光宜如何俯仰顾盼，声情宜如何悠扬潇洒，可谓剖析入微。宾若之表兄沈伯安^①亦镇上士绅，于其老屋中筑小书斋，布置自出心裁，窗明几净，书画盆栽皆有雅致。我三人得暇

辄往访，到则无所不谈，而伯安尤好谈美，“赏美”“伤美”常挂口头。镇外四五里有张陵山，名为山而无石，灌木自生，高树无多。假日晴明，我三人偶或一往，聊寄游山之意。而各村敬神演草台戏，亦尝往观数次。归来评论所见诸角色，伯祥之兴致最高。

余在中学时尝随同学刻印。以刀雕石，须留者留之，不须留者去之，是固人人所能为，无待求师。及抵角直，睹某氏所藏之《文三桥印谱》，思欲仿效之，乃于业余时间复事奏刀，凡以印章石来嘱托者无不应。其时伯祥辄在旁谛视，商量于布局之先，评议于终刀之后，且出所有印章石俾余刻之，刻何字何语，作何形何式，多所授意，故为伯祥刻者特多。惜此事历一年即止，以后未复执刀，于治印一道终为门外汉耳。

伯祥家自苏州铁瓶巷迁居角直约在一九一六或一九一七年，赁镇东陈氏大厅后之楼房上下六间。其处距五高三里许，到校有两途可循，一沿河岸而行，复折而南，一则曲折循田塍行，出眠牛泾即为保圣寺天王殿前之旷场，此较近捷。伯祥每晨到校恒当住校四人晨餐之时。傍晚放学，学生散尽，事务理毕，乃归其寓。偶然有兴，沽酒共夜饮，半酣而归。而余总觉视前岁稍